

主持人语



徐海

“天气渐渐凉了。”这是女儿读小学时苏教版《语文》课本上的一句话，只要天气真正转凉，我们全家就一定会背诵这篇课文的全部：“天气渐渐凉了，冬生给奶奶送毛衣。奶奶看着漂漂亮亮的毛衣，问：‘毛衣是谁织的？’冬生说：‘毛衣是妈妈织的。’……奶奶把冬生紧紧地搂在怀里。”对女儿乃至我们全家而言，这篇课文里有两个梗。一是我家隔壁有个女儿的同学叫“梁乐”，与“凉了”谐音。女儿有发现谐音字间有趣点的特长。比如有次她问妈妈和奶奶在哪，我告诉她，她们在剥

豆(事实上她俩正在剥蚕豆)，女儿就会淘气地在小黑板上写上“她们在搏斗”；我有次买了一件新皮夹克，女儿在我皮夹克上摸了又摸，嘴上说“好滑”，马上又在小黑板上写上“爸爸皮夹克豪华”。我十分惊叹于她的文字想象力。第二个梗是，她不明白为什么奶奶听“毛衣是妈妈织的”后把冬生紧紧搂在怀里，问如果是姑妈织的或是爸爸买的，奶奶还会搂吗？在我被催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我也不经意之间使用了文字的想象力。本月事务繁忙，本版“编辑故事”主持人语的交稿时间又似乎提前，于是我未动脑筋即复

执着催稿的编辑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如果说孩子长于语词的形象，那优秀编辑的选题策划同样需要想象，正如本期作者之一的朱胜龙先生所言策划“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当然也要基于“妈妈织毛衣、奶奶搂冬生”故事的内在逻辑。朱胜龙先生是我工作时即已敬仰的出版人，不但他的作品不断地见诸报章，见解常新，多为我辈所得，他在退休之后仍酷爱出版，像滚雪球般地不断策划出版几部大工程，像永动机似的生产出新的内容。况正兵是我的新识，源于赵波兄的介

绍。他们俩是浙江出版界的新锐总编辑，文笔均精健，思想都活跃，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浙江出版的未来。夏天叶国斌老总、邹亮兄、正兵、赵波与我们在骄阳下的西湖相见，正兵兄与我互赠彼此新作，读后引为知己。正兵兄散文集《低头思故乡》不仅仅是真诚，而且是赤诚，文笔嬉笑不怒骂、怀旧不迂腐、酣畅不放纵，甚是好读，读后想见其为人。我去约稿，他谦虚后如约提前发我。本期他的作品果然异于常人，专讲他是如何遇到令人头疼的作者又如何与之斗智斗勇的，我读后噗嗤嗤地笑个不停。

出版如同滚雪球

朱胜龙



选题好比“雪球”，开发没有穷尽。只要找准挖掘点，捕捉引爆点，深耕不止，探寻不息，往往会有新的发现。2013年我退休后，一个机缘巧合，使我进入了为优秀出版人树碑立传、讲述出版人精彩故事的选题策划领域，也许是无意中挖到了选题的“富矿”，我策划的出版人系列图书项目的“雪球”越做越大，越做越做不完，越做越有做头，越做影响越大。“出版人系列”的4种(辑)图书中，有3种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有2种被分别列为“十三五”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

精彩故事 时代见证

“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是我策划的“出版人系列”的第一个项目。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出版改革40周年。波澜壮阔的出版改革历程，堪称中国出版发展史的黄金时期，也把一批领军人物推向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出版一套为新时期、新时代优秀出版人树碑立传的自述体丛书，组织他们回顾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和遇见的人，回放留存的文化印记和留下的文化印记，从自己的经历中挖掘、提炼原汁原味的故事，体现新时期出版人的职业追求、使命担当和文化情怀，适逢其时。找到业内公认的领衔人物，是丛书成功的首要条件。出版家聂震宁站位高，口碑好，在出版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显然是丛书主编的不二人选，而且他与我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彼此投缘。聂震宁看了我写的策划方案，觉得这套丛书应时、应景、应运而生，很有价值，认为“50后”的出版人正陆续离开工作岗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写作，出版丛书的时机基本成熟。他不但愿意出任丛书编委会主任，而且表示带头写一本。

聂震宁发挥在业界的威望和影响力，组建了由中国出版协会各专业工作部主任组成的丛书编委会，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强调作者必须是在全国出版界有一定影响、获得韬奋出版奖等全国性奖项、已卸任的出版社领军人物。之后，聂总还邀请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担任顾问并写序，我则负责组稿和初审。丛书第一辑的作者龚群、樊希安、齐学进、周百义、吴培华、涂华等，和我都有过交往，彼此熟悉。他们平时都习惯于向作者组稿、催稿，但这次却成了我的组稿对象。也许是受丛书主题的感染，或是历史使命的召唤，他们都乐意参加，有的还放下手头的约稿，把完成我的约稿作为“优先项”。有的作者过去当出版社总编辑时，还向我组过稿，如时任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2003年在策划、组织《现代出版学丛书》时，曾给我“下达”过写作任务，而且三天两头电话催稿，“逼”着我克服惰性，写出了学术专著《现代图书编辑学概论》。这次却轮到向他组稿，不过他比当年的我自觉多了，水平也在我之上，很快就“交了卷”。

丛书以国内首创、亲历自述、真实感人等特色，通过出版人讲述的精彩故事，体现出版改革的丰硕成果，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先后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在丛书第一辑“旗开得胜”的基础上，我接着又策划了丛书第二辑：“走进新时代：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邀请了李朋义、汪继祥、俞晓群、李学谦、张延扬、吴宝安、何承伟、何志勇、任超等知名出版家“加盟”，他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工作，但都以存史立言、资政育人为重，雕龙绣虎，纵横驰骋，很快进入“角色”。由于丛书第二辑的策划思路、主题思想、作者队伍阵容等延续了第一辑的特色，于2022年双双被列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取得了“大满贯”。

出版的本质是服务，图书出版只是专业服务的一种形式，服务的延伸没有止境。2018年是出版改革40周年，受一位老社长的启发，我进一步拓宽思路，策划了出版改革成果系列宣讲活动。2019年1月，聂震宁在北京做了首场宣讲报告，此后我先后参加了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西安和深圳举行的6场报告会，扩大了丛书的影响。

深度合作 精耕细作

在策划“出版人系列”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中国出版协会、韬奋基金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等的领导，在他们的启发下，对深耕出版人系列选题有了新的认识，“趁热打铁”，跟进策划了“民营书业创业者丛书”和《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开启了与中宣头出版社、团体的深度合作模式。

“民营书业创业者丛书”是国内第一套优秀民营书业创业者群体的“自画像”，由他们讲述创业故事，梳理创业思路，抒发创业感慨，以此展现民营书业创业者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反映民营书业作为新兴出版生产力，对我国出版业发展的贡献和推动，见证我国出版业的繁荣发展。这个选题得到了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的大力支持，他不但亲自担任主编，组织中

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遴选了8位全国优秀民营书业领军人物，还分别给这些作者打电话，交流沟通，形成共识。这些作者都是民营书业界公认的行业标杆，他们怀揣文化报国理想，在长期的坚守、深耕中形成了独有的经营优势，如全国馆配行业的领头羊、人天书店集团董事长邹进，数字出版开路先锋、龙源数字传播集团董事长汤潮，践行“创新是灵魂”“质量是生命”的世纪金榜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泉，让最美书店成为全国城市地标的钟书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浩等。他们敏锐地感知改革潮流，抓住改革机遇，把家业做成产业，把产业做成事业，以责任成就伟业。把自己的创业经历浓缩成十几万字的自传，这既是民营书业企业自身创业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民营书业乃至出版业持续发展的历史方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套书计划2025年出版。

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时在媒体看到老一辈出版人去世的信息，这些出版前辈“择一事终一生”，亲历了出版界的重大事件，见证了出版业从筌路蓝缕到波澜壮阔的跨越式发展，以“口述文字+视频”的形式，留存他们的记忆，留住他们的风采，出版人责无旁贷，而且功德无量。我逐步形成了《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的策划构思，鉴于这个项目实施的时间跨度大，口述内容涉及面广，口述作者居住分散在全国，在中国出版协会的支持、推动下，组建了以时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为主编和相关领导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同时打破地域界限，拓宽合作边界，组成了由江西高校出版社、青岛城市传媒影视文化公司和北京书友之家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共同参与的口述视频访谈录制小组，在地方出版社、专业影视制作公司和出版服务公司的优势互补中，形成了新的优势，为项目的实施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项目有两个特点：其一，作者都是全国出版业有影响力的出版前辈，他们参与或经历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创造的典型经验等，当时对促进全国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作为，在出版发展史上留下了坚实的印迹，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发行处处长王久安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创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原董事长陈为江创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如今已成为业界具有风向标作用的年度盛会。由于他们年事已高，平均年龄超过了85岁，其中半数都是耄耋老人。近年来每年都有人离世，进行口述实录显得尤为紧迫，成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项目。其二，在出版口述类图书中，我们首创把口述文章和口述视频融合，读者在阅读口述文章的同时，还可扫码收看口述视频。我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优势，通过多条渠道，与前辈们或其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整理、形成口述文章的基础上，我们组成了口述视频录制团队，到老一辈出版人家中，逐个进行访谈，录制口述视频，打撈历史碎片，挖掘历史细节，为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这些前辈虽然已至暮年，但精神矍铄，提及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心潮澎湃。遗憾的是，在19位作者中，去年以来，有4位前辈驾鹤西去，告别了这个世界。如92岁的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刘硕良去年5月在家中接受采访时，对往事历历在目，侃侃而谈，没想到4个月后就与世长辞，录制的口述视频，成了这位老出版家的“绝唱”。但聊以自慰的是，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融媒体项目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保存了他们的精神遗产。该书的策划、出版，得到了中宣部出版局和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公室的高度重视，中宣部出版局审阅了书稿，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公室把这个项目列为2024年资助项目。

2024年9月28日，在国家版本馆举行的《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融媒体)新书发布会上，《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作为“出版人系列”的开篇之作，引起出版界的关注。这既是研究、开发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出版人口述”系列策划、出版的新的起点。(作者系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我与作者的两个故事

况正兵

编辑家们回忆往事，都爱提学识渊博与道德高尚的作者，礼尚往来的交往，如沐春风的交谈，是生命中美好的片段，是记忆中美丽的画卷，当然应该公之于众，树立典范。但这样的作者肯定不占多数。对多数编辑，尤其是对小社的编辑而言，日常所急，是如何对待那些水平有限但要求颇高的“普信”作者。对此，我愿贡献我的“智慧”。

我的编辑生涯中，与两个作者有过不欢而散的冲突。两次冲突都发生在我编辑生涯的早期，那时我还是助理编辑。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2007年。当时社长交给我一叠旧稿，告诉我：这个书稿已经耽误了好几年，没人看，你来处理它，争取年底出书。我接过一看，是一部古籍整理的书稿，密密麻麻的竖排繁体小字，全是一堆堆的中医理论文字。粗略一翻，许许多多的缺字黑块，似乎是完全没处理过的样子。

与作者的联系一开始就剑拔弩张。他是高校教授，见了此稿，很不高兴地说，这分明是未经修改的初稿。三年前他看的样稿，不是这个样子，他费力修改过的地方，完全没有体现到书稿上。特别是缺字的黑块，他明明已经一一写在样稿上。

“你们工作怎么能这么干？”他质问道。我灰溜溜地拿了书稿回来。到排版部去管领导、编辑部主任、编辑、排版员……参与此书的人员都换了个遍。作者所说修改过的稿子是否返回，又给了谁，被问者均茫然。我自知理亏，想来想去，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一核一对原文，把缺字都补上，调整好之后出一份新样稿再去找作者。好在每段文字都标明了出处，找到原文并不困难。于是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所有的缺字都照着原文补好；有些缺字并不是生僻字，很容易打出，不理解为何会是黑块。我又发现多处引文与核对的文献字句有出入，逐一核对，全部改正。我确实花了大力气，把样稿寄回给作者时，得意洋洋，以为会收获一些表扬。

几天后，作者给我打电话，语气中并无表扬：“谁叫你乱改的？全都改错了！我的原稿是有版本出处的，一字一句都有来历，你为什么非要改？必须照我的笔迹改回去！”我在惊恐忐忑中等待书稿返回，打开一看，修改的字句他基本上都划掉了，旁边注明“版本不一，不要妄改”，但有些字修改得非常奇怪，比如他圈出“敬”字，一条斜线引出一个圆圈，圆圈中写了一个缺了最后一捺的敬字；圈出“弘”字，同样改为缺了最后一点的弘字。

我忍不住给他打电话，询问原因，他语气很不友善：“这是避讳字。要跟版本保持一致，异体字、避讳字，都要一模一样。你懂不懂文献学？”我先愣后怒，认定他才是不懂文献的人，心里和语气同时失去了恭敬，立即表示：“异体字我可以接受，避讳字绝不能照你意见改。”理由有三：第一，缺字字，质检会当成错字，算一个差错；第二，造字一个字五毛钱，这个钱谁出？第三，本书的造字，已经很多，造字的编码都快不够用了，后期很麻烦，造字错位就更麻烦。最后我补了一句：“大宋、大明、大清都亡了几百年了，你还为封建规矩招魂呢……”

他“啪”地挂断了电话，强烈的声音通过耳机传递到我的耳朵，令我感受到了巨大的不满。

我的不满在他之上。几个月后，作者主动联系我：年底快到了，希望这本书能够年底出书，就好进学校算成果。他语气舒缓，我也就当没事发生，告诉他：编校工作按部就班进行，清样快好了，年底出书应该来得及。他说：“希望能看一下清样，毕竟是署自己名字的书，如果错误太多，影响不好。”语气中分明有不信任。我回答：可以，这



是你的权利。我们约在工商银行的大堂里见面。为何选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说他忙，只有在银行排队等候办事的时间里，才有空跟我见面。银行大堂的座椅上，坐了七八个等待叫号的顾客。我把书稿交给他，坐在他旁边。他翻稿子，翻着翻着就开始指责我：“这里怎么能这么改？这里又弄错了！你们认真一点行不行？”我装作聆听他的意见，频频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半吊子水平还想教我？选这个有钱的地方讨论古籍用字问题，其他人会不会觉得这两个人有毛病啊？”

突然，他霍地站起，把稿子往地上一砸，怒气冲冲地说：“不看了，都是错，受不了你这个宝器！”然后大步走开。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是低头环视，似乎周围的人都在看我。我突然意识到：大事发生了，作者冲我发火了，我脸丢大了。最好的办法是迅速离开，免得周围的人记住我。但稿子是最重要的，必须要捡起来带走。

我一言不发，快速捡起散落的白天花的稿子。我尽量面无表情，心里却很慌，尤其是蹲下、伸到座位底下捡稿子，头触碰到顾客的大腿，却不敢开口请人让开，生怕一口气憋不住哭出来。我捡完稿子，快速离开大堂，全程没看任何人。

回来以后，我定了定神，跟同事讨论此事。我说：“我全程都没有说话啊，只管听，不知道哪里惹怒了他。”同事说：“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人家只要不傻，一眼就能看出来。”并教育我，“表情管理，是很重要的技能，成大事者，喜怒哀乐都要不形于色。你还得修炼……”

二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2009年。2008年底，社领导叫我接待一个来自区县宣传部的作者，该县想出一本宣传本地抗震救灾先进事迹的书。那时地震的余波尚在，大家都在忙着灾后重建。我一听来意，顿时心生不满：重建尚未结束，你们竟然开始表功。等到看到书稿，更加无奈：这本书就是把各个记者写的宣传稿未加任何修改就汇集起来，有报道，有特写，还有散文诗歌。我已经预感到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不仅因为书稿的繁杂和粗糙，还因为作者似乎已经习惯了唯上的工作方式，对某些修改意见置若罔闻。他只有一个要求，要在一周周年纪念日前出版此书，同时又指导我：你们赶紧批个书号去印书，哪来那么多意见？你最好啥也不干，我是搞文字工作的，能处理好。

在后面的编辑工作中，这位作者事必躬亲，足称典范。他经常来社里，来了之后就加新文章，因为不断有新闻产生，也就不断有新文。他亲自坐到排版的小姑娘旁边，盯着她调版式、改文句、换顺

序……弄得差不多了，就打印一份纸质稿带走。这些事情，他并不通知我，所以几天后社里审过的样稿返回来修改，面对的是面目全非的排版文件。他要求做样书，装订成册，好提交给领导审阅，毕竟领导需要有直观的感受，不能交一叠纸上去。一而再，再而三，我从劝说，到无奈，到愤怒，心中渐渐积聚了层层岩浆，火山一样，就等爆发。

某一天，他要求做第四次样书，这次要加上彩色插图。我告诉他，做一次样书挺贵的，这真是最后一次了，后面不能再做；同时，希望你们不要再加任何文章了，定稿遥遥无期，出版也就遥遥无期。他再一次答应。在做彩色插图的时候，我问，插图有的并无图说，请问要如何处理。他说，你随便挑一个其他的图说暂时放在那里，填个空，领导看的是形式不是内容。

十余天后，他带回样书，坐到排版员旁边，要求改稿。我得到消息，冲了下来，翻着改成花脸猫的样书，克制着说：你说不会不再改的。

“有错怎么能不改？”他生气地说，接着开始一个个指出问题，“这个错了，这个也错了，难道能不改吗？”最后他指着彩插中的一张照片说：“这个更离谱，这明明是重要照片，文字却毫无关系。你们是怎么编校的？”

这句话点燃了我。我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他说：“明明是你要求的，我照你的要求做，你还有脸来怪我？”事后，近在咫尺被吓傻的排版小姑娘告诉我：当时你声音真的很大，满脸通红，仿佛要吃人。作者也和我嚷嚷起来，但声势上明显输于我，毕竟我是主场作战，而且年轻气盛，嗓门比他高，脸皮比他厚，用词比他狠。他怎么还击的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最后他一边骂一边往外走：“我去找你们社长投诉。我不信没人治得了你。”

我嘴上说：“你去告啊，我不怕。”心里却着实有些恐慌。

三

两本书，后来都出了。教授作者无奈接受了不造避讳字的“蛮横”建议。他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认真把书稿过了一遍，体现了对文字的敬畏和对名声的爱护，令人佩服。另外一个作者此后没敢再加新文，书按时出版——适当的发疯果然有助于解决问题。

两次冲突，一次是作者先失态，一次是编辑先破防。总结起来，似乎“先声夺人”的人好比比赛中“先发制人”的人，要背负激化矛盾的责任，道义上处于下风。比如第一次冲突，作者是个教授，尽管我有错，但失态的是他不是我，责任仿佛没落在我身上，回想起来，坦然得多；第二次，我也只是些弱。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他也就是个弱势的公务员，出不出书，怎么出书，很多事情由不得他，我把怒火发在他身上，不免有欺软怕硬之讥。

对编辑而言，作者是掌握资源的“上帝”。作者若不慷慨赐稿，编辑就成了无田可耕的农夫，失业而后失所，后患无穷。不管因何而起，在冲突发生时，编辑已经输了。当然，世上作者成千上万，秉性各不相同，编辑一生中总会遇上几个奇葩。有的作者一贯骄横，有的作者不知他人苦，适度的冲突，正好是适当的教育，有助于改良社会风气，但要注意适度。

我与两位作者后来都再也没有见面，从此相忘于江湖。对第二个作者当时恨得咬牙，如今连名字也忘记了。不知对方是否还记得我，是否还记恨我。再剧烈的波澜，站远了看，也不过是平缓的涟漪，并不重要。我当时的委屈、慌张、愤怒，现在看来，显得多么可笑。诚恳地说，最好再不相见；如不得不见，我也愿真诚道歉。这些曾令我不快的人，何尝不是一种良师益友？(作者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